

教育研究

学派兴衰的历史考察及其对一流学科建设的启示

——以法兰克福学派和奥格本学派为例

何振海,刘玉杨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19世纪以来的近现代科学史上,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曾涌现出众多成就显赫的研究学派。这些学派有着不同的发展境遇,或持续繁荣、或昙花一现。不同的兴衰境遇,与学派自身在组织机构平台、学术理论的持续创新以及核心人物和团队代际间传承等多方面的路径走向有着密切关系。结合学派与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内在逻辑,以推动学派稳定发展、实现学派持续繁荣的历史经验为参照,中国大学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应主动引入学派意识,着力为一流学科成长提供健康的学术土壤,鼓励学科确立特色化的学术基石和理论引导,培养兼具学术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学科带头人,打造具有内聚性、开放性和持久延续性的学术团队。

关键词:学派;大学学派;一流学科建设;法兰克福学派;奥格本学派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21)01-0108-08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21.01.013

“学派”(School),是一个古老的学术现象,古希腊时期就曾涌现出毕达哥拉斯学派、米利都学派、斯多葛学派等著名学派,这些古老的学派在推动相关学术领域发展方面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近代以来,伴随着近代科学研究活动的专门化、职业化和密集化趋势,学派开始再度兴起于西方学术舞台,在主要的科学门类中几乎都诞生了一批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9世纪以来大学在科学研究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导致同期诞生的众多学派和大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另一角度来看,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生态群落,学派在形式上与现代大学中组织化的学科之间也有极高的相似性和关联度,学派的成败得失和兴衰历程背后所蕴含的规律性内容,对大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同样具有极富针对性的参考价值。本文遵从上述逻辑,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立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和奥格本学派(Ogburn School)为案例,结合两者的不同发展境遇,辩证分析学派实现持续繁盛、稳定传承的内在规律,进而探讨学派意识观照下中国大学一流学科的建设路径。

一、学派兴衰的不同境遇:法兰克福学派与奥格本学派发展概述

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共同体,学派与其他学术组织一样遵循着大致类似的生长“周期律”,有其孕育、

收稿日期:2020-10-10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大学学派研究——以一流学科培育为视角”(HB18JY007)

作者简介:何振海(1978—),男,河北石家庄人,博士,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教育史。

诞生、成熟、衰落的生命周期。具体到学派个体的微观层面,可以发现不同学派的生命周期差异极大。一些学派体现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通过学派领袖和团队成员共同努力不断在学术道路上推陈出新,在顺利实现团队代际更迭的过程中确保了学派的长期繁盛;一些学派则与之相反,尽管创立之初能够以优异表现在学术舞台大放异彩,但学派的命运却如昙花一现,绽放之后很快就归于沉寂。法兰克福学派和奥格本学派正是学派兴衰这两种不同境遇的典型案列。

(一)持久繁荣的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为平台、以批判理论为核心的著名社会哲学流派。该学派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仍然活跃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其开创的批判理论范式对西方现代社会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机构源头可以追溯到1923年在法兰克福大学创立的社会研究所,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围绕社会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团队才具有了学派的基本特征^[1]。在这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研究所第二任所长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霍克海默于1931年就任所长,在他的领导下,社会研究所的研究转向“对人类命运的变迁的哲学解释”^[2],进而在此后逐渐树立起批判理论的领导旗帜,并创立《社会研究杂志》作为学派最新学术成果的发布平台,同时还形成了一个以霍克海默为核心的学术团队,成员包括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弗洛姆(Erich Fromm)等。这个团队的“工作植根于欧洲哲学传统的中心又针对目前的社会问题,并吸收当代的经验性技术,由此形成研究所成就的核心”^[3]⁴⁰。研究所的建制性发展为学派在学术成就方面的巨大飞跃奠定了基石。尽管此后由于德国法西斯政权的迫害,研究所不得不几经辗转迁至大洋彼岸,“侨居”美国^①,但在学派的组织凝聚作用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然成为研究所历史上最著名的学术辉煌期之一,涌现出霍克海默的《传统的理论和批判的理论》《独裁主义国家》、马尔库塞的《哲学和批判的理论》《理性与革命》、弗洛姆的《逃避自由》、阿多诺的《权力主义人格》等一批影响深远的论著,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作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创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哲学理论”^[4]⁹,并为学派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20世纪40年代末,应联邦德国政府邀请,霍克海默、阿多诺、波洛克等人从美国返回德国。经过筹备,社会研究所于1951年正式回归法兰克福大学,阿多诺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所长。由此法兰克福学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前述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第一代成员继续产出高水平的成果外,学派还涌现出了一批学术新秀,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弗雷德堡(Ludwig von Friedeburg)、施密特(Alfred Schmidt)、内格特(Oskar Negt)等,他们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成员的杰出代表。这一时期学派的学术成果同样层出不穷,包括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转变中的社会》、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爱的艺术》、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哈贝马斯的《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知识与人的利益》、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等。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批判理论被“新左派”运动者接受并奉为思想武器,批判理论的影响力突破学术界,名声大噪,尤其“20世纪60年代末席卷全欧洲的学生运动使法兰克福学派的声誉达到了顶峰”^[5]¹¹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阿多诺、霍克海默、弗洛姆等学派第一代核心成员的相继离世,以哈贝马斯、弗雷德堡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成员全面支撑起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1981年,哈贝马斯出版了《交往行为理论》,对“法兰克福第一代代表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了修正和重建”^[6],实现了对批判理论的现代化转型,使批判理论重新焕发活力。哈贝马斯由此成为学派理论转型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并被视为学派第二代的“理论导师”。但是,哈贝马斯的理论“使交往理性之‘达成共识的有效性要求’缺失了内在的规范性内涵”^[7]¹⁴²,因而遭到来自学界的批评。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以霍耐特(Axel Honneth)为代表的第三代成员的崛起,法兰克福学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作为第三代的学术核心,霍耐特出版了一系列的

^① 1934年5月,霍克海默造访纽约,接受了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 Buttler)的建议,将研究所迁至哥伦比亚大学。同年研究所主要成员马尔库塞、洛文塔尔、波洛克、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等相继抵达纽约(阿多诺于1938年到所工作),由此开始了研究所在美国长达17年的“侨居”时期(期间在1940年后霍克海默等人从纽约迁至加州大学继续开展研究工作)。

著作,在《为承认而斗争》一书中对“规范性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使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说”更趋完善。霍耐特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个人学术成就及其对学派理论的引领上,还表现在学派建设方面。2001年霍耐特接替弗雷德堡担任研究所所长,他调整学派研究方向,确立了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发展思路^[8];积极发掘新一代学术梯队成员,被视为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的福斯特(Rainer Forster)和尼森(Peter Niesen)等人开始崭露头角;此外,霍耐特还积极举办学术交流活动,努力扩大批判理论的国际影响。时至今日,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已走过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但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学术活力,其未来发展仍然值得人们持续关注。

(二)短暂辉煌的奥格本学派

奥格本学派是20世纪2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个致力于技术社会学研究的学术派别,其名称来自于创始人奥格本(William F.Ogburn),该学派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开辟了技术社会学的一个特定领域——“发明社会学”(Sociology of Invention)。学界一般认为,1922年奥格本所著《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奥格本学派的发端;1935年学派另一核心成员吉尔菲兰(Seabury C.Gilfilan)所著《发明社会学》的出版,完成了发明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搭建,奥格本学派由此进入发展的高峰期。

奥格本学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迅速崛起,得益于发明社会学理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奥格本学派开创的发明社会学理论,首次系统地从事社会环境中寻求发明的推动力,探讨了发明的文化决定论、发明的组合累积模式和发明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等主题。发明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19世纪以来发明创造井喷式涌现的社会现象,其对发明诱发机制等相关内容的研究既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政府机构的青睐,由此为发明社会学以及奥格本学派的兴盛提供了历史契机和现实氛围。此外,学派创始人奥格本对发明社会学理论的运用推广也是促进学派快速兴起的关键因素。奥格本191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奥格本将统计学方法引入发明社会学,通过对发明活动的定量分析,总结发明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开创了对发明的预测和影响研究之先河。此外,奥格本还是一位致力于将理论应用到实际的社会学家。20世纪20年代末,奥格本已经开始在为政府提供审查方案和政策建议的委员会任职。1930—1933年,奥格本兼任胡佛总统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主席,此后还曾任职于消费者咨询委员会、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及人口普查咨询委员会等。在任期间,奥格本参与了《最近美国社会趋势:总统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报告》和《技术趋势与国家政策——以及新发明的社会意涵》两份报告的撰写^[9]。他在其中充分阐释了发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并尝试对发明进行预测。这两份报告不仅为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效参考,也使发明社会学成为一门广受关注的学科,从而吸引了不同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参与到发明社会学的研究中,除吉尔菲兰外,还包括厄舍尔(Abbott Payson Usher)、肯普佛特(Waldemar Kaempffert)、伯纳德(Luther Lee Bernard)等。这一时期,随着发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大量著作得到出版,如奥格本的《与机器一起生活》《不断变化的社会趋势》和《技术与社会学》、厄舍尔的《机械发明史》、吉尔菲兰的《发明社会学》《发明船舶:船舶历史上从浮木到螺旋桨船的发明研究》等,使得奥格本学派的发展达到鼎盛。

但是,奥格本学派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学派那样具有师承式的组织关系,团队大多数成员也并非只专注于发明社会学的研究,而仅仅是将其作为各自学术事业的一部分。例如厄舍尔作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其主要兴趣在经济史,他从事发明问题的研究是基于试图探讨技术发明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需要。肯普佛特是一名新闻作者和杂志编辑,他对发明社会学的关注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科普的需要。伯纳德则试图从心理社会学的角度阐述发明的产生。另外,尽管奥格本学派的存在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该学派始终没有搭建起自己的机构平台,虽然1950年吉尔菲兰曾发起成立发明社会学协会,但吉尔菲兰自己也承认:“没有人对这个学会感兴趣,我也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这个学会的建立没有得到任何资助,所以这个组织从没有任何进展。”^[10]

1959年,学派创始人奥格本去世,此后在20世纪60年代由一系列社会危机导致的美国“反文化”运动又进一步加剧了奥格本学派生存环境的恶化,学派的命运急转直下,在很短的时间内便销声匿迹。对于这样一个曾引起包括学术界、政府等在内的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产生出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理论且盛极一时的学派而言,其短暂的生命周期不能不令人遗憾。

二、学派兴衰不同境遇的原因解析

法兰克福学派和奥格本学派都是 20 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在各自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研究学派,但前者自创立至今仍然活跃在学术舞台之上,学派领袖和团队成员历经更迭,却始终以完整的学派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而后者仅仅存续了 30 余年,在学派创始人奥格本去世后旋即走向衰落,甚至出现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无人问津的窘境。两个学派不同的历史境遇值得后人深思。众所周知,在某个学科或学术领域出现若干能够持续繁荣的研究学派,对该学科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极为有利的。鉴于此,后人有必要深刻省思导致法兰克福学派和奥格本学派不同命运的内在原因,或者说,从两个学派的不同境遇中,后人应该对如何实现学派这一特殊学术共同体的持续繁荣,有更为深入的思考和解读。

(一)学派的持续繁荣需要可靠的平台依托

外在和显性的平台依托,是一个学派能够持续繁荣的最可靠的“物化”基础之一。毫无疑问,将学派成员凝聚到一起的首先是学术因素(如指导理念、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这是一个学派之所以创立的精神前提,但从确保学派的长久存续和长远发展来看,则必须寻求坚实可靠的平台依托。依托平台,学派能够更便利地获得发展所需的软硬件资源,学派成员能够获得更明确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机构组织下的学术行为和学术活动也能够具有规划性和延续性,从而为学派的学术生命提供保障。由此观之,是否具有可靠的平台依托,恰恰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奥格本学派出现不同命运的重要原因。

法兰克福学派自创立之日起就是一个依托实体机构而形成的学术研究流派,即使是在迁居美国期间,它也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在机构上的支持。而且社会研究所是一个具有相当独立性的组织,特别是该所获得了相当大的财务自由。这得益于研究所发起人韦尔(Felix Weil)的慷慨出资。“1923 年,韦尔不仅支付了新研究所大楼的建筑费用,还承担了研究所全年高达 12 万帝国马克的经营费用”^{[11]4}。“此外,他们还建起设备完备的图书馆,馆内藏书从建所初年的近 14 000 本及近 200 种国内外学术期刊,到 1929 年底,上升到藏书 40 000 多本,订阅了近 400 种报纸杂志”^{[11]10}。法兰克福学派“侨居”美国期间,韦尔还曾为之捐款 10 万美元。二战后法兰克福研究所重返德国时又得到了美国和德国一些政府组织和个人的资助,不仅重建了法兰克福研究所大楼,还得到了开展研究所需要的资金支持,这为研究所在“20 世纪 60 年代一跃成为享负盛名的各个版本批判理论思想中心”^{[11]33}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研究所提供的平台依托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成员们即便在二战期间的颠沛流离中也能够保持对学派的归属感,不至分崩离析进而造成“学脉”中断。时至今日,社会研究所作为法兰克福大学一个重要学术机构的地位始终得到确保,法兰克福学派从研究所获得的平台支持也始终得以延续。

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奥格本学派的一个重大组织缺陷就是该学派没有建立起可供依托的平台机构。奥格本学派仅凭奥格本的个人成就与声望在一段时期内吸引了一批人才进入发明社会学领域,推动了学派的繁荣,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为这批人才提供一个实体平台。1950 年成立的发明社会学协会也没有得到任何资助,即使是唯一的终身致力于发明社会学研究的吉尔菲兰也从来没有得到一个专门的岗位从事这项研究。相反,“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却在几十年漫长的职业生涯中饱经坎坷”^{[12]39},他一生从事多种职业,却没能成为一名职业的研究者。没有平台,奥格本学派的发展就面临缺乏资金来源、无法形成独特的组织文化和学术氛围、成员缺乏组织归属感、学派发展没有规划、学术活动缺乏组织协调、学术方向分散等一系列的问题。仅靠核心人物个人声望或魅力在短期内能够形成的一个看似繁荣兴旺的学派,但在核心人物离世后必然无法维系,只能走向凋零。

(二)学派的持续繁荣需要富有生命力的学术理论

理论是一个学派存在的生命线,也是一个学派保持其独特性的根本所在,学派的兴衰是其理论生命力的直接体现。对于一个学科发展而言,开创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理论,并不断地根据社会发展更新和弥补理论缺陷,无疑会促进他们在这一领域的长期兴旺与繁荣,从而也有利于深厚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自信的形成,为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科和学术流派奠定基础。

应该看到,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派成员总能够敏锐地结合社

会需求对自身的批判理论进行发展和完善。霍克海默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新变化的理解,领导法兰克福学派建构了最初的理论体系。“侨居”美国期间,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肯定的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过程中建立起独特的学派理论。在理论创新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每一代更迭都是一次对既有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改进,每一代都敏锐地觉察到上一代理论中的不足,并提出了使之更加完善的理论设想。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再从哈贝马斯到霍耐特,每一代领军人物对学派学术理论的传承与创新,都在推动法兰克福学派一次又一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与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批判理论相比,奥格本学派的发明社会学理论在发展活力上显得先天不足。“在发明社会学研究者中,并非每位研究者都讨论了每一个观点,而是每个人只强调了理论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所有的理论汇集起来形成了发明社会学的框架体系”^[10]。即使是在奥格本学派最辉煌的时期,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发明社会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进而去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仅仅维持一种松散的理论联系。除此之外,奥格本学派的理论还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厄舍尔一方面认为发明是普通思维持续活动的结果,否认英雄人物在发明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论述了发明的出现需要发明者具有特殊的想象和需求感知能力,而这些能力只有特殊的发明家才具备。此类矛盾直接影响到学界对其理论的认可,导致学科理论为大众所抵触,进而成为制约学派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没有人将这些零散的学派理论整合成一个系统,加上对理论中存在的矛盾和争议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解释,最终导致奥格本学派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三)学派的持续繁荣需要学术核心及团队的培养与代际传承

学派从来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人(学者)的组合;一个学派的兴起,需要学派奠基人与前辈学术骨干的不懈努力,而将这个学派延续下去、发扬光大,更需要一代代认同学派理念的学术团队成员的代际传承和接续努力。确切地说,“学派是向科学进军的梯子队、人才群”^[13],由于单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因此“科学工作者只能‘站在前人的肩’上从事新的探索,而且只能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从事新的发明、创造”^[14]。对于学派而言,有意识地构建基于学术认同的内聚性学术团队,努力实现学术核心人物引领下的学术团队代际间的有序传承,不仅是学派持续繁荣的必要途径和基本体现,也是学派理论不断完善并发挥其应有价值的重要保障。

法兰克福学派自创始之日起就始终高度重视学术传承人(群体)的培养,从而为学派的发展不断注入新鲜活力。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培养了众多学生,如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以及作为学派中坚力量的内格特、穆勒-多姆(Stefan Müller-Doohm)、克劳森(Detlev Claussen)等。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完成博士论文后,哈贝马斯于1956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在那里,他和阿多诺一起工作”^{[15]352}。哈贝马斯一生也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包括施内德尔巴赫(Herbert Schnädelbach)、阿纳森(Johann Arnason)、埃德(Klaus Eder)等。霍耐特在被哈贝马斯聘为助理教授的6年间,他们紧密合作,经常共同举办研讨会,这不仅使霍耐特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学派理论的学习,也帮助其形成独立的学术研究能力。最重要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培养的众多学生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仍然致力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探讨,这使得学派始终能在批判理论的旗帜下不断吸收和凝聚新的学术力量,这样一支基于学术认同的内聚性团队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持续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奥格本学派吸引了一批优秀学者参与到发明社会学的研究中,正是这些人的加入使奥格本学派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遗憾的是,奥格本学派所组建的学术团队过于松散,成员彼此之间缺乏稳固的学术和组织纽带。由于缺乏稳固的联系纽带,这些成员大都没有认真思考发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推广和后续发展问题,同时也缺乏对奥格本学派这个学术品牌的身份认同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无法形成一个有具体组织形式的研究团体。更为关键的是,学派创始人和其他骨干并没有把培养一批认同发明社会学理论的后辈学人作为一项攸关学派命运的大事来做,如奥格本、厄舍尔等人,尽管在大学任教期间也培养了众多学生,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学生培养成认同学派基础理论、积极从事发明社会学研究的合格传承人,从而致使奥格本学派在本质上成为一个缺乏扎实学术和组织根基的松散集合,团队成员对学派缺乏足够的学术认同和必要的责任意识。这为20世纪60年代奥格本学派的迅速衰落埋下了深刻伏笔。

三、学派意识观照下一流学科建设的路径借鉴

学派和学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近代以来诞生的绝大部分学派都以特定大学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学科为依托,学派的产生和延续往往对所在大学和所属学科的发展产生不可言喻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学派在成长过程中开展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特色凝练、团队搭建等活动,几乎与大学学科建设的使命任务完全重合;此外,“学派本身几乎囊括了学科发展所需的核心要素:个性化的特色学术方向、稳定而内聚的师资队伍、持续且高效的科学研究、系统性的人才培养以及可靠的平台保障等”^[16]。就此角度而言,考察学派的兴衰历程,分析学派的成败经验,进而形成学派意识,无疑对大学里的学科建设,尤其是正在着力开展一流学科建设的中国大学,具有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结合本文对法兰克福学派和奥格本学派不同历史境遇及其原因的阐释,中国大学在探索一流学科建设路径过程中,应从学派意识的角度有更为深入的路径思考。

(一)为一流学科成长提供适宜的学术和制度土壤

一流的学派不仅拥有一流的人才,还拥有一流的学派文化、学派价值、学派制度和学派梯队。学科发展以大学为依托,在培育世界一流学科的过程中,必须着力于学术生态系统建设,实现学科人才、学科文化、学科价值、学科制度的深度融合,形成学术整体,从而发挥各分支要素的最大价值,提高学科持续创新能力、繁殖能力和竞争力。在资源支持方面,积极拓展资金筹集渠道,建立资金支持长效机制,在争取更多财政投入的同时,重视科研成果的收益转化并吸收广泛的社会支持,为学科建设提供坚实后盾。在文化建设方面,必须培育学术共同体意识,形成共同的学术价值追求,打造独具特色的学科文化素养,强化学科认同感、归属感,激发学科成员的进取意识和担当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团结高效、具有凝聚力和荣誉感的学科团队。在学科制度建设方面,既要平衡外部机制也要加强内部机制建设。“政府性力量与政策性资源不直接介入学科门类确定、学科团队搭建、学科平台建设、学科管理运行规则设计等微观环节和具体领域”^[17],鼓励发挥经费驱动的杠杆作用,以促进学科理论方向的转变和创新。在给予学科内部群落一定的自由和空间的同时,要让学科建设能够按照正确的轨道运转,从而实现学科快速发展。学科内部发展上应探索符合学术规律的治理模式,正确认识和有效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赋予学科带头人引领理论方向、凝聚研究团队、配置学术资源等方面的实质性学术权力和组织权力。

(二)鼓励学科确立特色化的理论基石

建立特色化的学术理论是一个学派立足于学术之林的支柱。一个富有特色的学术理论,不仅能保障学派的持续繁荣,还能够有效促进该学科的跨越式发展。“学科是一门学问的知识集成”,“学科建设的过程就是知识的保护、传承和创造的过程,是知识体系的建构、维护和更新的过程”^[18]。社会现实是一个学科成长的土壤,打造具有特色的学术理论必须关注社会实际与学术前沿,寻找具有发展潜力的学术生长点。“这是一项需要超凡学术智慧的工作”^[19],在这一过程中,资助学者团体在相关领域开展深入研究,鼓励学科之间的切磋和竞争,减少研究人员在刊物出版和学术交流方面的壁垒,给予学术思想充足的生存空间,都是打造呵护学术萌芽生长内外环境、避免窒息学术萌芽的重要举措。在理论体系的维护和更新方面,聚焦学科研究目标,集中学科研究力量,人力物力上的资源倾斜,都将为理论的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后盾支持。其次,将理论应用到社会实践中,为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案指导,由此使理论研究走出封闭的学术圈,进入到广阔的社会现实中接受大众检视,利用大众的关注和支持为理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还应注意,学科理论的发展必须具有纲领性和系统性,而不是漫无目的的“野蛮生长”。“由于对学科定位不清与不准,导致学科研究范式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也存在严重问题”^[20],这成为很多学科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就学科发展的张力而言,学科理论范式必须符合学术发展规律,学科发展理论必须具有指导性、纲领性。

(三)培养兼具学术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学术传承人

建设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科,既应该注重扩大人才培养的规模,为学科接续发展积蓄力量,也应该注

意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为学科理论的发展培育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科成员。“建立一支宏大的朝气蓬勃、富于生机的学术梯队,这是大师问世的前提”^[21]。须知,只有在学术“高原”上才能产生学术“高峰”,因此必须着力培植学术“高原”。首先,注重采用“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无论是在理工科的实验室还是文史类的研究室,教师对学科领域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传授将既有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把握学科知识脉络和研究范式,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科认同。鼓励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既是对既有学科知识的审视和检验,也是促进学科理论不断完善的重要手段。其次,重视采用行之有效的教研方法。“习明纳这种在西方大学史上已被反复验证的行之有效的、能充分实现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的教学方法,无疑对我国大学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16] 习明纳的教研方法改变了传统教学中的知识授受模式,给予学生极大的自由,使教师和学生都成为知识和真理的探索者和发现者。习明纳创造的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将成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重要工具。

在打造学术“高峰”方面,应该注意到,“大师”是在适宜的学术土壤中“生长”而出的,并不是“推举”或“指定”产生的。应该注重对学科领军人物学术水平的要求,但同时还应避免将学术能力作为衡量其能否作为学科带头人的唯一指标。“学术素养或学术水平也许可以决定学者个体所能达到的学术高度,但却远不能支撑其所在大学所属学科的学术纵深”^[16]。学科带头人不仅是学科学术发展方向的指引者和学术团队的组建者,还肩负组织管理学术团队、协调学术资源的重任。因此在加强学术训练的同时,必须给予学术下一代必要的组织和团队协调能力方面的训练。

(四) 打造具有开放性、内聚性和延续性的学术团队

开放性、内聚性和延续性的学术团队,是一个学科生命力的重要保障和具体体现。开放,意味着学科能够吐故纳新,不断吸收新鲜的学术养分,涵养学术活力;内聚,意味着学科能够始终保持特有的学术气质和学术品格,在成长过程中不至迷失方向,失去学术个性;延续,意味着学科能够形成代际传承的发展格局,确保学术事业的持久接续。团队建设是学科建设工作的重要环节,建设一流学科就必须组建一流的学术团队,而开放、内聚和延续又几乎是所有一流学术团队的共有特征。就现实而言,各个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学科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就是努力构建起一流的学术团队。然而,驱动一流学术团队形成的动力从何而来?在实践中,很多大学会首先选择运用更为直接、效率更高的行政力量来指挥甚至直接介入学术团队的组建,然而在学术世界中行政力量的直接性和高效率又常常会“失灵”,因为行政力量固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将一批学者聚集在一起,但必须认识到,一流的学术团队绝不仅仅是一批学者哪怕是一批一流学者的机械组合,“只有当一批具有学术认同、秉持共同或相似的学术理念、致力于一致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学者汇聚在一起时,才有可能搭建起一流的学术队伍”^[22]。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比行政力量更有效的,是学术力量。而学派,恰恰能够提供这样的力量。“显然,只有学派这样的组织最方便、最有可能承担此重任。因为学派可以利用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学术组织和学术群体并把这些力量有效凝聚起来……高校应利用学派的这一特点汇聚天下精英”^[23],构建起能够体现鲜明个性特征的高水平学术团队。

参考文献:

- [1]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上[M].孟登迎,赵文,刘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
- [2] MORKEZMER M.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Early Writing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 [3]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M].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4] 欧力同,张伟.法兰克福学派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5] 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6] 李樵.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历程的可视化研究[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4(1): 21-28.
- [7] 王才勇,方尚琴,王婷,等.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 [8] 王凤才.“法兰克福学派”四代群体剖析:下[J].南国学术,2015(2): 158-176.

- [9] 吴红.奥格本学派的形成及其对技术社会学的意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2):40-46.
- [10] 吴红.论奥格本学派的衰落[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191-197+280.
- [11] 瓦尔特·布什.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M].郭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12] 吴红.发明社会学:奥格本学派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 [13] 李体秀.从欧洲自然科学史看大学与学派[J].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82(4):160-166.
- [14] 李体秀.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科学学派[J].曲阜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1):75-80.
- [15] CALHOON C.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2.
- [16] 何振海,贺国庆.西方大学史上的“学派”现象:变迁、特征与现实观照[J].教育研究,2017(8):143-151.
- [17] 赵渊.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J].中国高教研究,2019(6):27-32.
- [18] 钟秉林.扎实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J].教育研究,2018(10):12-19.
- [19] 张铭,何振海.吉森大学李比希学派的历史贡献及其原因探析——基于一流学科培育的视角[J].现代大学教育,2019(5):50-55.
- [20] 王竹立.衰落,还是兴盛?——关于教育技术学科前景的争鸣与反思[J].电化教育研究,2017(1):5-14.
- [21] 张端明,蔡勛.营造学术大师脱颖而出的软环境[C]//华中科技大学,台湾大学.海峡两岸面向21世纪科技教育创新研讨会论文集.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2000:166-170.
- [22] 何振海,王璇.学派勃兴与学科崛起——李比希学派对吉森大学化学学科兴起的历史贡献及现实省思[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71-79.
- [23] 黄明东,陈梦迁,刘博文.论学派要素培育与大学学术进步[J].教育研究,2015(6):38-45+95.

(责任编辑 侯翠环)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Rise and Fall of Schools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s ——Taking Frankfurt School and Ogburn School as Examples

HE Zhenhai, LIU Yuy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there have been many research schools wi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both natur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se schools have different historical fate, either sustained prosperity or just a flash in the pan. The different fate of those school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chools' organization platform,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academic theory, and the transgenerational succession of core persons and teams. Combining with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rnal logic between schools and disciplines, by referr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improving schools' development steadily and seeking sustainable flourishing, Chinese universities should introduce school consciousness actively, strive to provide positive academic conditions for the growth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s, encourage disciplines to establish academic groundwork with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 cultivate disciplines leaders with academic and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build a cohesive, open and sustainable academic team.

Key words: school; university school;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rankfurt school; Ogburn school